



范志春 编著



王 稹 年 谱

河北教育出版社

王 韶 年 谱

张志春 编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新登字006号

内 容 提 要

王韬(1828—1897),是鸦片战争以后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倡导开放、改革、变法自强的先进知识分子,是近代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最早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著名学者,被人誉为“西方问题专家”;由于他曾上书支持过太平天国,又被称为“长毛状元”。该书系统、详尽地记述了近代史上这位奇才复杂而异乎寻常的一生,并对他在诸方面的成就进行了新的评价。这是思想界、史学界、文学界的的专业工作者、业余爱好者及广大读者不可缺少的一本最新读物和工具书。

王 韬 年 谱

张志春 编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6.75印张 170千字 1994年11月第1版

1994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4.90元

ISBN 7-5434-1905-X/K·4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我厂调换)

輸送箱王

翰 遺 指 王

一部研究王韬的开山之作

——序张志春的《王韬年谱》

苏双碧

张志春同志是一位文艺工作者，但他对近代史上重要思想家王韬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写成《王韬年谱》，这不仅是一本史料翔实、文字晓畅的学术著作，而且对王韬的思想发展脉络也勾画得比较清晰、准确，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

在鸦片战争中，地主阶级抵抗派林则徐就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了有效地抵抗外来侵略，就必须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当时魏源把这个思想概括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林则徐和魏源之所以能在侵略者的鸦片输入和大炮声中看到侵略者有可“师效”的一面，主要原因是林、魏都是清中叶著名的经世致用派。经世派主张“道、学、治”三者而一，学以致用。其奋斗目标是救世，含义是治国、安邦、振兴清王朝。他们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思想又比较开拓、进取，不保守。这一派面对着英国殖民主义者鸦片输入，坚决主张禁烟；面对着侵略者的大炮，奋起抵抗。同时，又超越了笼统排外的狭隘思想，主张学习西方长技以自强。经世致用派在鸦片战争前后有较大的发展，对此时及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70年代出现的著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马建忠、薛福成等的思想脉络，实际上是林则徐、魏源等经世致用派思想的继续和发展。王韬在《扶桑游记》中曾经写道：“默深先生‘师长’一说，实倡先声。”说明他希望“西国之学术技艺大兴于中土”的思想是来自魏源的“师夷长技”的主张。在

漫游欧洲时，感到“眼界顿开，几差别一世宙”，认识到中国封疆“自域”之不可取。因此，他主张吸收西方之法来变革中国的社会，即所云“借法以自强”。

近代中国是一个逐步开放的中国，其途径无非两条。一是侵略者用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社会，用不平等的条约迫使中国接受开放商埠、出借租界，强迫中国敞开门户，便于掠夺中国的财物，这一条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二是中国人的觉醒，首先是在知识分子队伍中，出现一批先进分子，主张努力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仿效西方的学术、文化、政治、经济来拯救中国，使中国达到自强的目的，这一条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并成为中国有识之士为之奋斗的目标。王韬是第二条途径杰出的探索者和实践者。他在游历欧洲和日本之后，对当时中国形势作了清晰的判断，认为是秦汉以来“又一变”。所谓“变”，是指西方各国纷纷来华要求“互市”。但是，这个要求“互市”是不平等的，即“挟其所有以傲我所无，日从而强其炫耀，肆其欺凌，相轧以相倾”。面对着这种形势，我们又怎能“不思变计哉”？那么，怎么变计呢？王韬主张在取土、练兵、办学校、制定律例等几个方面效法西方，改造原有的封建国家的政权机构，提倡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同时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以使祖国民富国强。当然，王韬的变法思想，不如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完善，但王韬的变法思想早于康有为变法思想近二十年，这在当时无疑是走在时代前头的，实为康有为变法的先导，可称难能可贵。

鸦片战争之后，进步知识分子的历程，多和接触西方文化有关。这当中，走出国门亲历西方诸国，思想变化尤为显著。较早游历欧洲的斌椿，观览伦敦的景象之后说：“此次奉命游历，始知海外有些胜境”，并且看到英国“一切政事，好处颇多”。而张德彝在欧洲看到火车和铁路之后，便大加赞赏，认为兴建铁路“不但无害于商农，且裨益于国家”。王韬早在墨海书馆工作期间，即已接触了大量西方文化，但他思想的彻底转变，也是在游历欧洲

之后，才从一个封建士子转变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他不但认识到“盖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并且认为“今日欲办天下事，必自欧洲始”。看到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方向，只有学习西方，中国才能跟着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前进。这个认识使他从理论上和行动上迅速转到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回国之后不久，王韬创办《循环日报》，撰写大量政治性文章，宣传变法图强，主张“尽用泰西之所长”。王韬的变法思想在 19 世纪 70 年代是比较成熟的，其论著内容十分丰富，在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年谱》不仅将王韬历史上一些重大情节，特别是他本人力图掩盖的情节如与太平天国的来往等等，均考证清楚，而且系统地把王韬一生思想历程有机地连贯起来，眉目清晰，重点突出。尤值得嘉尚的是《年谱》对王韬这样一个复杂人物，作了中肯的评价。因为王韬不但是清王朝的士子，而且仰慕过太平天国，曾经向太平天国上书献策，后来又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先驱。对这样的人物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揭示近代历史进程的规律，并借鉴于今天的开放、改革。这也是作者写作《王韬年谱》的本意。正如作者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所说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从研究王韬的文言小说入手，逐渐对王韬其人感了兴趣，故而这几年围绕王韬读了点近代史方面的书籍，并阅读了王韬的几乎全部著作，感到过去史学界、文艺界、思想界对他注意不够，评价欠公允，偏低。他是近代史上唯一与清政府、外国势力和太平天国这三方面均有特殊关系的人物，是近代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第一个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学者。由于他放弃科举前往墨海书馆工作和上书太平天国这两次异乎寻常的选择，使他卷进时代斗争的漩涡和浪尖之上，从而导致了他特殊的经历和遭遇，造就了他的新思想和超前意识。通过研究他，对于我们今天及今后的开放、改革大有益处。”出于这种动机，作者在写完《王韬年谱》之后，还想写王韬评传和王韬传记小说。这样深入对一个历史人物作锲而不舍的

研究，并从文、史两个方面进行写作，在文史学界还是不可多得的。我们期待着张志春同志继年谱出版之后，评传和传记小说能相继和读者见面，这对近代史上人物研究将增添新的内容，作出有益的贡献。预祝作者的计划早日实现。

1989年1月于北京沙滩

前　　言

清末江苏人王韬（1828—1897年），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奇特的人物。由于他离经叛道的个性和异乎寻常的经历，使他成为近代史上最早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著名学者；由于他曾深入苏州、南京，亲自考察过太平天国，后来又上书献策，从而震惊中外，博得一顶“长毛状元”的桂冠；由于他西游欧洲、东极扶桑，与英、法、美、日、越、朝等各国人士广泛地交朋友，认识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已大大缩短，地球成为合一之天下，从而较早具有了现代意识，成为中国最早的“世界村”公民之一；由于他潜心研究西方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社会制度和科学文化，博通古今，学贯中西，从而使他成为当时著名的“西方问题专家”；由于他直接承继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很早就鼓吹尽用泰西之所长、变法自强，改革清朝腐败的政治制度，从而成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先驱；由于他积极创办报纸、杂志、出版社，十分重视舆论公开在中外交涉与民主政治中的作用和力量，从而使他成为现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奠基者之一；由于他晚年主持格致书院，改革教育方法，培养了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从而使他成为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又由于他在诗歌、散文、小说等多方面的创作成就，使他成为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学家，特别是在继承蒲松龄《聊斋志异》的优良传统，创作文言传奇小说方面，堪称中国古典短篇小说最后一位巨匠。

王韬一生著述十分宏富，刊行、未刊者，总计不下四十种，使读者不免望而生畏。同时，国内外记述他身世历史、逸闻轶事的

文章著作也很丰富。但是，由于迄今为止，国内在研究王韬方面，不仅没有专著，而且连个系统准确的年谱也没有，因此关于王韬的身世历史其说不一，误传甚多，对他的评价就更为五花八门，褒贬不一了。

比如远在1874年刊行的《庸闲斋笔记》一书，其中专有一篇记述王韬上书太平军一事的文章《王畹上李秀成陈攻上海策》。作者陈其元与王韬是同时代人，曾在江苏巡抚薛焕的幕府中工作，并亲眼见过王韬1862年2月2日（同治元年正月初四，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逢天义刘肇钧稟，后来，他又代理过上海知县，但是，在他这篇距事件发生刚刚十年左右而写就的文章中，竟然错误四出：一将王韬上刘肇钧稟，误为上李秀成书；二将从刘肇钧营地搜获此书，误为李秀成床下；三将英国传教士所办墨海书馆，误为美国人所办；四将王韬逃往香港，误为“遁入咪喇坚墨海书馆以死”。

又如，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谢兴尧、罗尔纲就在胡适先生指导下考证过王韬上书太平军一事，洪深、陈振国、简又文等人亦撰文考证王韬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及其是否考中过“长毛状元”，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商衍鑒先生的专著《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设专章考证王韬实际并未参加过太平天国的考试，更没有中过状元，所谓长毛状元，“乃是那时朋友间所赠予的雅谑，当作取笑他的资料，并非真有这么一回事”。但是，直到1984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传记文学《第一大总统》（黄继树、赵元龄、苏理立著）一书，还在第一部“天王府里”，说孙中山1894年由广州经上海北上天津，准备上书李鸿章，在上海认识了太平天国状元王韬。王韬当时未满花甲（实际上已六十七岁），生得气宇轩昂，谈吐不凡，使孙中山敬佩不已。王韬详细地谈到了洪秀全，讲述了天王府的宏伟建筑，又讲到“韦杨事变”，太平天国由盛至衰，直至1864年7月19日天京城破，天王府被大火吞没。王韬讲得

伤心泪落，长叹一声：“唉！转眼已经三十年过去了！”王韬还吟了两句惋惜哀伤的诗：“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俨然是一位活灵活现的“长毛状元”。这自然是文学作品的描述，但亦不是凭空杜撰。它所依据的主要史料来源——陈少白所著《兴中会革命史要》，的确白纸黑字，说孙中山见的就是太平天国状元王韬，难怪小说作者要做如此发挥。

这种以讹传讹的文章和著作还有不少。即使被人奉为圭臬的辞书字典，亦有此类错误。如《清代七百名人传》云王韬“少避乱，居广东”，“壮岁返里”，“韬既陷敌中，上书陈攻取上海之策”，“时秀成势日蹙，不遑他计，置书床下”，韬“卒年七十有八”，等等，均与事实不符。又如《中国人名大辞典》，云王韬“官广东省，以偏袒太平军去职”，其实王韬一天官也没当过，更没有在广东任过职。又如《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云“太平军之变”，王韬与蒋敦复“在沪谋响应，事败，遁迹广东”，亦与事实不符。又如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 年版《辞海》和 1982 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其中讲王韬游历欧洲一事，都说他曾游历过英、法、俄等国，其实王韬并没有去过俄国。

由于对王韬身世思想缺乏全面研究，对其著作系年不甚明了，致使对王韬的评价产生偏颇的例子，也在所不少。例如胡绳同志所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981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讲王韬的著作“一贯地表示反对太平天国的立场”，他在 1862 年 2 月 2 日上书太平军之后，“这个王韬，不久后又在上海用同样的观点拟了一封给曾国藩的信”，“把王韬给曾国藩和太平军双方出的主意综合起来，其实是要他们都放弃江、浙沿海一带，而在长江上游互相争夺。把江、浙一带放弃给谁？显然是给英国人。所以王韬到太平军中混了一下，如果不是受英国人直接指使的话，也是站在为外国侵略者服务的立场到农民革命中来的投机分子”，等等。且不说上述这些断语，对王韬上刘肇钧稟和拟上曾制军书的

内容如何断章取义、以偏概全、随意加以曲解的，首先一点，著者对收入《弢园尺牍》卷六中的《拟上曾制军书》的写作时间，显然就弄错了。《拟上曾制军书》并非写于上刘肇钧稟之后，相反，写于它之前，即1861年10—11月间。其次，王韬这封写给曾国藩的信，只是“拟上”，并未真正上过，而且它的发表是在太平天国被镇压十二年之后的1876年，即出版《弢园尺牍》以明其忠君爱国之心迹时才公之于世的。据此以评价王韬，而且将他说成是“为外国侵略者所培养和保护的知识分子”，显然是欠公允的。纵观王韬一生的思想行动，他不仅是一位伤时忧民的爱国志士，而且是一位民本思想十分突出、并初步具有民主意识的思想家。他在许多文章、诗歌、日记和书信中，不仅认为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完全是由清朝政治极度腐败、官逼民反而造成的，而且多次讲到，所谓“今日之贼，即昔日之民也。倘治民不善”，即当政者不能顺乎民心，富民强国，使人民各得其所、安居乐业，“则今日之民，即可为后日之贼”。在镇压太平天国的问题上，他反对清政府和官僚士绅（如冯桂芬等人）借助洋兵平定的主张。他说：“室不相和，出语邻家，可谓通计乎？父挞子而嗾瘸狗噬之，有是理乎？”一直到太平军被镇压十五年之后，他为日本友人编纂的《明治诗文》一书所写的《粤逆崖略》一文中，在谈到太平军初期盛况时，还说：“观其所至，令智者处此，似足以联声合势，明法立纲，策励兵众，约束行伍，举贤以自辅，爱民以自固，或可有为矣。”由此观之，如果说王韬一度曾经同情太平天国，寄希望于农民革命的成功，并非过誉拔高之词。当时友人赠他以“长毛状元”的雅谑，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另一方面，从事后王韬无论如何检讨自己，表白忠君爱国，积极为当轴者出谋划策，将功补过，终其一生，亦不被清政府宽宥、起用来看，恰好从反面证明，他确实支持过“长毛贼”，是“有罪于朝廷”的。

以上只是我个人对王韬的一点评价。究竟应该如何评价王韬，

应由历史界、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文学界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但是，有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即王韬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主张开放、改革，大胆学习外国的长处，使中国尽快富强起来，实现近代化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我们研究他的身世、研究他的思想、研究他的著作，研究他提供给我们的一切有益的东西，无疑是大有必要的。

为了给研究王韬的工作提供方便，做一点铺路石的微薄贡献，我花了几年工夫，亲自或托人跑了北京、上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图书馆，查阅了上千万字的资料，编纂了这部《王韬年谱》。由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已经被打破了闭关自守的状态，被迫与世界各国联系在一起；而王韬又是较早具有现代意识、开放意识和超前意识的“世界村”公民，因而这部年谱与以往中国历史人物的年谱有一个大的区别，那就是不仅罗列王韬本人每年的行状和中国的大事，而且将世界主要国家的大事首先罗列出来，以便将中国与世界对比，将王韬放在世界范围内加以考察。如此，提供给读者的信息量和思考研究的东西会更多一些。

该年谱依据的主要资料是世界历史、中国近代史和王韬本人的著述。史事部分，主要参考书有《外国历史大事年表》、《中国近代史词典》、《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剑桥中国晚清史》、《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近代中日启示录》、《上海近代史》等。王韬行状，主要依据《弢园老民自传》、《眉珠庵忆语》、《蘅华馆诗录》、《蘅华馆日记》、《弢园尺牍》、《弢园尺牍续钞》、《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瀛堧杂志》、《瓮牖余谈》、《海陬冶游录》、《弢园文录外编》、《弢园著述初编》等书。为简洁起见，恕不一一注明出处。但重要之点，或有不同说法之处，以及引用上述所列书目以外的资料，则均加以注明，以便读者查考。为了同以往的史料、资料记载相一致，凡人物年龄均照传统的虚岁计算，

不予改动。年谱前附有《王氏家谱一览表》，以便读者一目了然。

由于水平和所见资料有限（比如台湾藏王韬 1849—1855 年日记六册，即未看到），本年谱一定会有错误或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张志春

1988 年 7 月

目 录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1828—1848）

1828 年（道光八年戊子），1 岁——生于 江苏甫里	(3)
1835 年（道光十五年乙未），8 岁——	(4)
1836 年（道光十六年丙申），9 岁—— 随父馆于施氏书塾	(4)
1839 年（道光十九年己亥），12 岁—— 随父读书吴村	(5)
1840 年（道光二十年庚子），13 岁—— 吴村读书	(6)
1841 年（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4 岁—— 读书吴村	(6)
1842 年（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5 岁—— 回甫里读书“青梦山馆”	(7)
1843 年（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6 岁—— 初赴昆山应县试	(8)
1844 年（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7 岁—— 与某女士初恋情深	(9)
1845 年（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 岁—— 以第三名录取新阳县学为秀才	(10)
1846 年（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9 岁—— 八月，金陵应乡试——冬，与杨梦蘅结婚	(11)

- 1847 年（道光二十七年丁未），20 岁——
 锦溪设馆授徒——写作《琐窗笔记》 (13)
 1848（道光二十八年戊申），21岁——
 赴上海市亲——锦溪授徒——写作《蒿目论》 (14)

第二章 上海墨海书馆时期（1849年—1862年）

- 1849 年（道光二十九年己酉），22岁——
 父病逝——应聘入上海墨海书馆 (19)
 1850 年（道光三十年庚戌），23岁——妻杨梦蘅病
 故——助麦都思译成《新约全书》 (21)
 1851 年（咸丰元年辛亥），24岁——为应雨耕作
 《瀛海笔记》——开始绮游，恋寥宝儿——移家沪上 (23)
 1852 年（咸丰二年壬子），25岁——钱莲溪为其介绍
 对象——李善兰入墨海书馆——结识蒋敷复——续娶林益
 扶女儿林琳为妻 (24)
 1853 年（咸丰三年癸丑），26岁——结识吴健彰儿
 子——回昆山应岁试——介绍蒋敷复入墨海书馆——助
 麦都思译太平天国书籍——撰写《瀛堧杂志》——结识
 周弢甫——开始写《海陬冶游录》 (26)
 1854 年（咸丰四年甲寅），27岁——加入基督教——
 结识洪仁玕——与红蕤阁女史相爱——陪麦都思、慕维
 廉游太湖 (28)
 1855 年（咸丰五年乙卯），28岁——管嗣复入墨海
 书馆，佐合信译医书——与周弢甫、孔宥涵、姚燮交游
 (30)
 1856 年（咸丰六年丙辰），29岁——郭嵩焘参观墨
 海书馆——送麦都思回国——九月赴昆山应科试——与
 仇家涉讼，患足疾——杨墨林来游沪上 (32)
 1857 年（咸丰七年丁巳），30岁——与伟烈亚力创

- 办《六合丛谈》合译《重学浅说》——结识徐有壬、容闳——回甫里养足疾 (34)
- 1858年(咸丰八年戊午)，31岁——与艾约瑟合译《格致新学提纲》等书——序《中西通书》——九月陪杨雅涵(笃信)游杭州——与孙漱交游——送舍信回国——钱莲溪随伟烈亚力赴汉口 (37)
- 1859年(咸丰九年己未)，32岁——主修《中西历书》完成——上书吴健彰——与舅父朱雪泉书，诉苦衷——与周弢甫书，论中西事理，学习西法——回昆山科考——与伟烈亚力合译《泰西通商事略》发表——岳父林益扶去世——向江苏巡抚徐有壬上和戎、御戎、防海、弭盗策 (41)
- 1860年(咸丰十年庚申)，33岁——与徐寿、华蘅芳、龚孝拱、魏盘仲、张肃山、郭友松、何梅屋、吴沫庵、袁伯襄等人来往——拒绝向西人借兵抵御太平军——同艾约瑟、杨笃信访问苏州，受到李秀成、刘肇钧接见——两次上书江苏巡抚薛焕，陈管见三十条
..... (46)
- 1861年(咸丰十一年辛酉)，34岁——与艾约瑟等人同赴天京，上呈洪秀全讨论基督教文章——六月与赵惠甫、魏盘仲等八人结盟——拟上曾国藩书 (54)
- 1862年(同治元年壬戌)，35岁——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先后入安庆军械所——奉母、妻、女还乡——2月2日上刘肇钧票——4月4日票帖被清军缴获——4月25日同治帝下通缉令——5月18日返回上海，从此闲置一室——8月19日母亲病死——10月4日逃往香港——入英华书院佐理雅各译经，晤屈烟山、黄胜等人
..... (58)